

蘇聯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回顧與展望

林 德 昌

一、前 言

一般而論，蘇聯對於中東政策的追求，乃係基於區域性和全球性雙重的戰略考慮。就區域性而言，自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國以來，已爆發了四次慘烈的中東戰爭，以阿雙方對立之緊張情勢，迄今未嘗稍減。因此，各方為解決以阿衝突，遂不斷要求召開中東和平國際會議商討之。蘇聯在中東地區，雖與大多數的阿拉伯國家有邦交，但自一九六七年以後，却與唯一的猶太國家以色列斷絕外交關係，直到現在雙方關係仍未恢復。此對蘇聯的中東政策，無疑是一項重大缺憾，因其無法在斡旋以阿衝突時，發揮重要的外交影響力。另在全球性戰略方面，主要係著眼於美蘇之間的勢力均衡。蘇聯在中東地區勢力的增加，即象徵美國影響力的衰退。由於美國與以色列關係向極密切，是故蘇聯與以色列的漸趨靠攏，不但可促使以色列與美國疏遠，亦可使美國過去在以阿衝突時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式微。質言之，蘇聯在追求中東政策時，區域性和全球性的戰略考慮，經常交互影響，是故以阿衝突乃成爲蘇聯追求這些戰略因素的最方便、最有利之工具，而與以色列親近，更是確保這些戰略因素的最佳手段。①

就以色列觀點而言，與蘇聯關係的正常化，可以打破阿拉伯國家企圖在外交上孤立以色列的努力，或亦可藉此引導更多的蘇聯猶太人移民以色列。然而，蘇聯與以色列在展開非官方接觸過程中，却發現彼此均有諸多難題與障礙橫梗其中，遂導致雙方關係正常化一時難以達成，不過基於現實利益，雙方之接觸依然持續著。本文除針對兩國未斷交前之關係作一簡析外，並進一步探討造成雙方在一九六七年斷交後，不斷進行非官方接觸的因素，以及這些接觸的方式與類型，最後並對蘇以關係之未來發展，予

註◎ Galia Golan,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in Soviet- U.S Relations", *The Limits to Power: Soviet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edited by Yacov ROl,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9), p. 7.

蘇聯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回顧與展望

以扼要之評估。

二、早期蘇以關係之發展（一九四八—一九六七）

一九四八年五月，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宣布建國，蘇聯乃是繼美國與瓜地馬拉之後，第三個外交承認以色列的國家。其後，阿拉伯國家入侵以色列，蘇聯除立予譴責外，更自蘇聯集團運送軍火給以色列，援助以軍抗拒阿拉伯軍隊的攻擊。由於蘇聯最初乃是反對猶太錫安主義（Zionism），故蘇聯之支持以色列，頗令人驚訝。然窺其底蘊，在於蘇聯認為以色列的建國，象徵英國勢力的退出，以及蘇聯影響力在中東的增強。反觀以色列，其願與蘇聯保持友好關係，乃欲蘇聯猶太人能順利移民以色列。

一九五〇年代初期，蘇以關係漸趨惡化，其主要因素有二：

（一）經過卅餘年的蘇共統治，猶太錫安主義仍對俄境猶太人具有相當之吸引力。如一九四八年，以色列首任總理梅爾（Golda Meir）訪問莫斯科，數萬猶太人夾道歡迎，此為將近兩千年來，首位猶太國家代表的造訪。此一事件令蘇聯當局憂慮其境內的猶太人，是否不再效忠共產主義，而傾向於猶太錫安主義？^②

（二）就當時國際情勢而論，由於以色列的轉向西方國家，以及美蘇冷戰的強化，亦造成蘇以關係之不睦。在美蘇冷戰之際，美國採取圍堵政策，以抗拒共產勢力的擴張，除透過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和北約組織加強西歐之安全外，並於一九五〇年五月廿五日，與英法兩國召開三國外長會議，聲明反對任何以武力改變中東地區現有疆界的企圖，復同意在該地區成立區域性的防衛聯盟。^③對蘇聯而言，此一防衛聯盟的形成，意味著西方國家在中東地區的軍事擴張，勢將對蘇聯構成威脅。但以色列認為其加入此一防衛聯盟，自有其利益可言。首先，以色列與阿拉伯鄰國都加入區域性防衛組織，必然有助於改善雙邊關係，並達成一項和平協定；再者，以色列的參與亦可減低其對手阿拉伯國家在軍事、經濟和外交方面的敵視態度。蘇聯對以色列此舉，必然不表滿意，遂指稱以色列已然成爲美國的一個工具。^④

於此內、外因素的影響下，造成以色列與蘇聯關係降低。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蘇聯當局逮捕九名醫生，其中有六位是猶

註② 一九四八年，蘇聯當局會因此逮捕了不少的猶太作家，並關閉猶太人的文化機構。

註③ Nadav Safran, "The Soviet Union and Israel: 1947-1969"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iddle East: The Post-World War II Era*, edited by Ivo J. Lederer and Wayne S. Vucinich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4), p. 164.

註④ Tarun Chandra Bose, *The Super Powers and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72), p. 8.

太人，渠等被控與猶太中產階級組織密謀殺害重要蘇聯共黨份子及軍事要員，^⑤致掀起了蘇聯境內反閃族之浪潮。二月九日，在特拉維夫的蘇聯公使館發生爆炸事件，雖然以色列政府迅即致歉，並願賠償損失，但遭蘇聯拒絕。兩天後，蘇聯與以色列首次中斷外交關係。^⑥

一九五三年三月，蘇聯頭子史達林死亡，以色列曾致哀悼之意，且表示同意審理上月公使館爆炸事件；其後，蘇聯當局亦釋放先前被逮捕的猶太醫生，於是雙方關係漸獲改善，經過一些非正式談判後，終於在同年七月廿一日恢復外交關係。以色列同意不加入任何反蘇的協定或聯盟，莫斯科亦與以色列簽署貿易協定，允許出口石油給以色列。^⑦一九五四年六月，雙方將公使館級提升為大使館級，蘇聯大使更在耶路撒冷呈遞到任國書。^⑧

蘇聯此時對以色列態度的轉變，主要仍係因應國際情勢的演變。自美國總統艾森豪就任以來，美國以所謂的「新展望」(New Look)政策，取代原有之圍堵政策，其目的乃欲在蘇聯周圍設置一些空軍基地，藉以直接攻擊蘇聯本土。為此，美國亟需在中東獲得此等基地，故有一九五五年巴格達公約(Baghdad Pact)的簽署。美國圍堵政策原以防衛性為主，現「新展望」則防衛與攻擊兼具。為應付西方國家此種策略，蘇聯認為以色列大可利用。因為以色列不僅同意不加入任何反蘇聯盟，且其本身利益亦與巴格達公約相違背。同時，在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五年間，西方國家為爭取阿拉伯國家的支援，也排斥了以色列。反觀蘇聯，則不斷譴責西方國家拉攏阿拉伯國家反蘇，並與以色列改善關係。儘管如此，在以阿紛爭中，蘇聯並未明顯地站在以色列一方，其亦經常在聯合國中支持阿拉伯國家的觀點。蘇聯此一作法，很顯然是要在以阿衝突之間，更具有轉寰的餘地。

一九五五年，蘇聯發現埃及可擔負區域性抗拒巴格達公約的重任，立即與埃及進行軍火交易。對此，以色列曾表示嚴重抗議，批評蘇聯集團不僅販賣武器給阿拉伯國家，且亦冷眼看待其境內猶太少數民族。^⑨一九五六年，蘇伊士運河(Suez Canal)戰爭爆發，蘇聯與埃及總統納塞爾(Gamal Abdul Nasser)站在同一陣線，宣稱任何對埃及的威脅，就是對所有阿拉伯國家的威脅。因此，當西方國家如英、法等國，聯合反對埃及時，以色列也公開支持西方國家。隨著戰爭的爆發，蘇聯即與美國合作，在聯合國大會中，支持譴責侵略埃及的決議案；莫斯科亦主張透過聯合國，給予以色列經濟制裁，並堅持以色列無條件撤軍。一九五

註⑤ Zachary Irwin, "The USSR and Israel", *Problems of Communism*, Jan.-Feb. 1987, p. 38.

註⑥ Abban Eban, *My Country: The Story of Modern Israel*,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p. 118.

註⑦ Dilip Hiro, *Inside the Middle East*,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82), p. 235.

註⑧ 由於大多數國家不願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蘇聯此舉自可表示對以色列的友善態度。

註⑨ Dilip Hiro, *op. cit.*, p. 236.

七年二月七日，蘇聯片面取消與以色列的石油供給協定^⑩，並召回駐以色列大使，蘇以關係漸趨惡化。

在蘇伊士戰爭兩年後，蘇以關係逐漸變成爲「有限對立」(qualified hostility)的形式。蘇聯除繼續支援阿拉伯國家軍火外，並經常在宣傳上抨擊以色列。而以色列除簽署一九五七年五月的「艾森豪主義」(Eisenhower Doctrine)外，並與西德展開軍事合作，此在蘇聯眼中，以色列無異屬於西方陣營。然而，蘇以雙方依然儘量避免過份激怒對方。

自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七年，蘇以關係仍然維持「有限對立」的形式。於此九年間，有幾項因素促使雙方關係改善，如文化交流的加強，以及蘇聯允許增加猶太人移民人數。^⑪同時，亦有其他因素促使雙方關係不睦；如蘇聯對約旦河水爭端之問題支持阿拉伯國家的主張，否決聯合國安理會譴責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從事破壞行動之決議案，並不斷主張嚴厲譴責以色列的報復行動。^⑫然而，上述事件仍未能促使蘇以關係發生重大改變。因爲自一九五九年以來，蘇聯已與伊拉克、敘利亞和埃及建立良好關係，並利用阿拉伯民族主義，將其勢力擴張至阿拉伯東方。再者，土耳其與伊朗亦對蘇聯示好，凡此已然使蘇聯在中東的影響力大爲增強，故與以色列維持「有限對立」，自可滿足其需要。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第三次以阿中東戰爭爆發。阿拉伯國家除指控英、美等西方國家協助以色列作戰外，並要求蘇聯援助，但蘇聯的反應極爲冷淡。最初，在戰爭前夕，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發生邊境小型衝突，都是蘇聯在背後支援阿拉伯國家。然而當以阿戰爭迫在眉睫時，蘇聯却迅即向敘、埃表示，不可期望蘇聯的直接參與戰爭。觀蘇聯此一態度，乃是避免在中東與美國敵對，從而捲入中東戰爭的漩渦中。故在戰爭初起之際，聯合國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蘇聯僅要求以色列停火，而未附任何條件。同時在戰爭的次日，克里姆林宮亦召開一次政治局全體委員會，除呼籲以阿雙方立即停火外，亦無其他表示。^⑬由於此次蘇聯對中東戰爭所表現的謹慎態度，實出乎阿拉伯國家意料之外，故除了對蘇聯大感失望外，阿拉伯國家的輿論，也開始批評蘇聯。有鑑於此，蘇聯旋於六月九日在莫斯科召開共黨國家高階層秘密會議，討論如何支援阿拉伯國家。參加此次會議的保加利亞、匈牙利、東德、波蘭、捷克、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各國共黨領袖，決議譴責以色列的侵略行爲，並與以色列絕交。蘇聯駐聯合國代表，亦在安理會指控以色列侵略，並要求以色列自所佔領的阿拉伯國家領土中撤出。六月十日，蘇聯宣布與以色列中止外交關係。以色列對於斷交除表示遺憾外，仍希望蘇聯未來會再次改變態度。此後，芬蘭與荷蘭則同意分別代表蘇聯和以色列的外交利益。

註⑩ *Ibid.*, p. 236.

註⑪ 一九六二年，對於境內猶太人的移民，蘇聯已作少許讓步，計有二千七百名猶太人獲准移民以色列。

註⑫ Nadan Safran, *op. cit.*, p. 170.

註⑬ 在一九五六年戰爭中，蘇聯曾以堅定的立場支持阿拉伯國家，並公開警告以色列和英、法等國，倘不停止攻擊埃及，蘇聯將出動廿萬軍隊加入戰爭。

三、推動默密外交的因素

自一九六七年蘇聯與以色列正式斷交以來，儘管蘇聯仍舊支持激進的阿拉伯國家與巴解組織，以色列亦與美國維持密切關係，蘇以雙方對蘇聯猶太人問題亦時有爭議，但兩國之接觸依然持續著。不過，雙方可說是在非官方的基礎上，透過各種管道而默默地拓展關係。這種默密外交（Quiet Diplomacy）的推動，對雙方而言，皆有其現實之利益。

首先，蘇聯希望能在中東地區維持外交影響力，而不致遭排除於中東和談之外。其次，蘇聯也關切在以色列的教會財產，故經常與以色列境內溫和派的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保持接觸。另就以色列的觀點而言，與蘇聯的接觸可繼續尋求蘇聯猶太人移民問題的解決；此外，以色列亦較喜與蘇聯直接交涉，而不願透過美國，蓋其認為美國之策略乃是欲利用以色列，舒緩美蘇之間的緊張關係。蘇聯與以色列經常藉著雙邊接觸，作為一種對於盟國的心理暗示。例如，蘇聯透過與以色列的接觸，可使阿拉伯國家更堅定的站在同一陣線，不致一面倒向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另當以色列受到美國逼迫或對美國政策不滿時，倘能適時轉與蘇聯接觸，勢必可使美國投鼠忌器。^④

莫斯科在許多場合中，經常宣稱承認以色列的生存權，且表示一九六七年的斷交，以及其後的拒絕恢復邦交，皆非對以色列生存權的否認。但另一方面，蘇聯也以政治、軍事和經濟支持以色列的敵人——阿拉伯國家，並聲援巴解組織之尋求國際承認，及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家的願望。^⑤凡此均一一顯示，蘇聯之目的仍欲在以阿之間左右逢源，以增加其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

在蘇以非官方接觸過程中，蘇聯當局可能祇是在表面上持禁止態度，實則不加反對，至於以色列方面，則情況較為複雜。凡準備前往蘇聯訪問，或欲在第三國會晤蘇聯官員的以色列人士，事先均需聽取政府簡報。不過，以色列政府本身對於與蘇聯會談的內容，亦經常因意見紛歧而產生爭議。^⑥雖然以色列慎重選代表與蘇聯官員進行會談，但事實上，雙方訪問團人員的組成，均在蘇聯的控制之下。蘇聯在派遣前往以色列訪問的代表團時，通常至少指定一位猶太人參與。至於蘇聯邀訪以色列人士，函件多半

註④ Arthur Jay Klinghoffer, "The Dynamics of Quiet Diplomacy: The Soviet Union and Israel", *Middle East Review*, Summer 1986, p. 40.

註⑤ Yacov ROY, "The Soviet Attitude to the Existence of Israel", *The Limits to Power: Soviet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edited by Yacov RO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9), p. 232.

註⑥ 在一九七六年，以色列駐美國大使狄尼茲和駐聯合國代表黑澤格（Haim Herzog），即會對於在紐約與蘇聯談判的內容產生爭議。

直接寄給個人，再由這些收到邀請函之人士，合組代表團，而非逕函組織或任一團體。^④此外，蘇聯邀請函的寄達，多在預定啓程前一週，其目的可能是要利用時間的緊湊，避免臨時產生政治困擾。由此可見，蘇聯藉著對代表團組成的控制，可在雙方會談時，發揮有利蘇聯的主導地位。

一般而言，蘇聯和以色列在接觸時所討論的範圍，主要在於雙方外交關係的恢復、以阿和平協定的可能內容，以及蘇聯猶太人的移民問題。上述諸問題與雙方關係的癥結如下：

(一) 以色列憂慮美蘇緊張關係的和緩，將造成美蘇兩國強制以阿簽訂協定，而其內容恐將不利於以色列。此即是以色列一直反對召開國際和平會議，而傾向於與阿拉伯國家直接談判的主要緣由。當美蘇關係不睦時，以色列在美國的中東戰略中，具有更大的利用價值，故在這種情況下，以色列可進一步要求獲得更多的美國軍經援助，使以色列成爲在中東地區抗衡蘇聯的重要角色。但是當美蘇關係持續緊張時，則蘇聯允許猶太人移民的人數勢必減少，在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情況下，以色列實是進退維谷。

(二) 由於蘇以缺乏外交關係，使蘇聯在拓展中東外交上，遭遇到相當的困難。反觀美國因爲同時與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保持暢通的外交管道，故一旦中東地區發生爭端時，美國即可以仲裁者自居，發揮其外交影響力。因此，蘇聯中東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即是希望能積極參與中東和談過程。雖然以色列經常反對蘇聯支持阿拉伯國家的立場，但目前以色列爲使約旦能參與中東和談，對此一問題也表現了相當的彈性。

(三) 關於蘇聯境內猶太人問題，早在一九四八年，蘇聯猶太人對以色列所表現的同情，已然令蘇聯當局懷疑其境內猶太人的忠貞問題。其後，莫斯科對境內猶太人實行差別待遇，猶太人幾乎全遭禁止進入所有黨政軍的高級職位，同時，亦不准猶太人保存自己之民族文化；一九七〇年初，蘇聯當局曾指出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方法有二：不是同化就是孤立。但莫斯科對於父母均爲猶太人者，則拒絕改變他們的護照，故事實上，要他們同化爲蘇聯人已是不可能的了。另外，關於移民到以色列的問題，在諸多因素的考慮下，蘇聯的審查亦相當嚴格。^⑤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蘇聯與以色列關係的好壞，並非是直接影響蘇聯猶太人移民政策的絕對因素。如在一九七三年時，蘇聯猶太人的移民共有三萬五千名之多，已是相當高的紀錄。另在十月中東戰爭期間，平均每月也有四千二百名移民的紀錄。^⑥反觀在蘇以關係密切時，却未見有更多的猶太移民。很顯然的，美蘇關係的和緩，才是影響俄境猶太人動向的主要因素。如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美國「傑克森修正案」(Jackson Amendment)的實行，造成一九七五年俄境猶

註④ 例如以色列共產黨的一些黨員，都是事先獲得蘇聯的個別邀請，而後再組成代表團，蘇聯不准渠等自行組團。

註⑤ W. W. Kulski, *The Soviet Union in World Affairs: A Documented Analysis 1964-1972*,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220-221.

註⑥ Arthur Jay Klinghoffer, *op. cit.*, p. 41.

大移民的降低，而後在一九七九年該修正案廢除時，移民數額方再告大量增加。總之，自從雷根政府成立以來，由於美蘇緊張關係的持續，終導致移民人數的銳減。

根據以上分析可知，基於國際情勢的錯綜複雜，中東局勢的瞬息萬變，以及蘇以雙方本身之戰略因素與利益考慮，故自一九六七年斷交以來，雙方依然透過許多不同的管道進行接觸。

四、接觸的類型

自一九六七到一九八〇年代初期，蘇聯與以色列雙方接觸的類型，主要係建立在開放程度的基礎上。這些接觸，有些是秘密的，有些是半公開的，或甚至是公開的，而且雙方傳播媒體亦多所報導。

一般而言，關於蘇以之間的接觸資料，主要係得自以色列的報紙與雜誌期刊。在報紙方面，如 *Haaretz*、*Maariv* 和 *Yediot Achronot*；在雜誌期刊方面，如 *Zoderech* 和 *Haolam Hazev*，這些都是蘇以秘密接觸的最佳消息來源。②蘇聯方面，則因對此類消息控制相當嚴格，故除有關中東和平計畫方面之報導外，凡蘇以雙方之接觸資料多半闕如。

(一) 在最開放的層面上，乃是蘇聯與以色列駐聯合國代表，在聯合國所進行的接觸或會談。如一九七四年四月、一九七六年五月，以及一九七七年二月和九月，兩國駐聯合國代表均曾晤談。此外，以色列也參加了由聯合國贊助在蘇聯召開的會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蘇聯副外長塞米歐諾夫 (Vladimir Semyonovich Semyonov) 與以色列駐聯合國代表提科 (Yosef Tekoh) 亦曾晤於紐約聯合國總部。至於其他高層次公開之會議，則有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之中東日內瓦會議，以及蘇以外長的一些會談。這些外長會談多半是在中立地區舉行：如一九七三年十二月，葛羅米柯 (Andrei Gromyko) 與伊賓 (Abba Eban) 在日內瓦；一九七五年九月，葛羅米柯與艾倫 (Yigal Allon) 在紐約；一九八一年九月，葛羅米柯與夏米爾 (Yitzhak Shamir) 在紐約等皆是。

(二) 在第二種層面上，則是雙方雖然公開接觸，但却很少獲得大眾傳播媒體的注意。

1. 學術方面：以色列經常派遣學者專家，參加在蘇聯舉辦的學術會議。例如一九七〇年的分子物理和農業、一九七一年的史學、一九七二年的檔案研究、一九七三年的物理學、一九七四年的黑格爾、一九七六年的地理學與政治學、一九八一年的醫藥，以及一九八三年的空中交通規劃等項會議。此外，雙方之科學家也交互訪問，如一九六九和一九七一年，以色列的化學家曾趨

註② *Ibid.*, p. 35.

訪蘇聯，一九七七年，蘇聯的太空科學家訪問以色列。^②

2. 在文化方面：一九七三年，在莫斯科所舉辦的一項影展中，亦有以色列的影片參加；同年，以色列的電影導演和製片家也訪問了蘇聯。其後，蘇聯的音樂家和歌唱家也訪問了以色列。一九七四年，一些蘇聯記者參加了在以色列所舉辦的一項新聞慶祝會。

3. 在運動方面：蘇聯和以色列的運動員，經常在國際上相互競技，比賽地點多半是在第三國。事實上，蘇聯的運動員從未在以色列從事競賽項目，而以色列則偶爾會派運動員前往莫斯科參加運動比賽。

4. 在宗教方面：蘇聯的東正教在以色列獲得了相當的支持，以色列且承認蘇聯教會之權威，因此蘇聯教會人員經常與以色列當局保持聯繫，並極力避免在政治上產生爭論。蘇聯東正教的領袖，亦經常訪問以色列，並得以會晤以色列的宗教和政府官員。

5. 在政黨方面：最初，以色列的政府代表團和政黨代表經常訪問蘇聯，但多僅限共產黨黨員而已。一九七一年八月，在以色列的一支六人代表團中，蘇聯首次擴大邀請五位非共產黨黨員。次年五月和八月，在前往蘇聯的以色列代表團中，也包括了其他政黨成員。^③

(三) 在第三種層面上，雙方的接觸經常不對外公開，一直要到既成事實之後。例如，一九七五年四至五月，以及一九七六年上半年，以色列大使狄尼茲 (Sincha Dinitz) 與蘇聯大使杜布萊寧 (Anatoly Fedorovich Dobrynin) 的數次晤談，即屬此類。另在較低層次的非正式接觸上，雙方亦在華盛頓進行會晤；如一九七一年六月，蘇聯與以色列的新聞特派員共進晚餐，一九八〇年七月和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二月，蘇聯在華盛頓的外交官以午宴款待以色列的特派員。

在貿易方面，雖然雙方直接貿易在一九六七年後已告中斷，但間接貿易仍透過第三國為之。另外，兩國之間的觀光旅遊活動，依然受到限制。蘇聯公民無法自由前往以色列，除非是正式訪問團體的團員；但持有外國護照的以色列人士，則可以個人身份前往蘇聯。一九八一年十月，有一支以色列觀光團，試圖經由羅馬尼亞轉往蘇聯，但仍遭蘇聯當局拒絕。

(四) 在最後一項接觸的層面上，則是幾乎保持絕對的秘密，如蘇聯高階層使節團訪問以色列。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七五年四月此類團體會訪問以色列，其間分別與以色列總理拉賓 (Itzhak Rabin)、外長艾倫和國防部長裴瑞斯展開會談。一九八三年三

註② 在婦女團體互訪方面，亦相當頻繁。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三年，蘇聯婦女團體曾禮訪以色列。一九七三、一九七七和一九八〇年，以色列婦女團體亦會回訪。

註③ Arthur Jay Klinghoffer, *op. cit.*, p. 38.

月，亦有一支此類性質之團體訪問以色列。

以上所言，即為蘇以兩國在一九六七年斷絕外交關係以來，所進行的四種接觸類型。而在這段期間內，雙方關係雖亦時好時壞，但大體而言，兩國均能維持友好態度，致未釀成重大爭端。如在一九七三年八月，以色列運動員在參加莫斯科世界學生運動大會中，受到蘇聯的差別待遇，且赫然發現阿拉法特（Yasir Arafat）竟也是開幕典禮中的貴賓；一九七五年九月，以色列舉重和摔跤選手，在莫斯科郊外的一項野餐會中，高舉國旗、唱歌舞蹈，後為蘇聯警察所驅散。一九七六年六月與一九八三年四月，希伯來大學與魏茲曼中心（the Weizmann Institute），分別頒發榮譽博士學位給蘇聯的分離份子沙卡洛夫（Andrei Sakharov），此皆引起蘇聯的不滿。

然而在這段期間內，亦有不少事件得以彌補雙方之不快。如一九六八年一月，一艘蘇聯船隻在土耳其沿海，救起了發生海難的五名以色列船員；一九七一年六月，以色列外長伊賓曾致電哀悼蘇聯三位太空人的死亡；一九七六年九月，一位蘇聯猶太籍上校之屍體，獲准運至東耶路撒冷埋葬；一九八〇年，以色列雖然抵制莫斯科奧運，但也在其國內提供了卅一小時有關奧運的衛星實況轉播。^②

五、現階段關係發展與未來展望

大體而言，在一九七〇年代，蘇聯對以阿衝突的態度具有相當的彈性，她從未關閉與以色列重新和解的大門。惟蘇聯並不希望此一問題及早或澈底的獲得解決，而是意圖在中東不戰不和的狀態中，攫取利益。降自一九八〇年代，蘇聯除繼續與激進阿拉伯國家保持關係外，亦與保守的阿拉伯國家如約旦、科威特等加強接觸。近年來，國際上要求召開中東和會之呼聲此起彼落，蘇聯為求能在和談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遂認為目前乃是向以國展開外交攻勢的最佳時機，復藉此削弱美以之間的親密關係。

一九八五年七月，蘇聯與以色列開始進行接觸。當時在巴黎安排戈巴契夫訪法事宜的蘇聯官員，曾與以國官員秘密會晤。戈魯訪法時更公開指出，蘇聯準備考慮與以色列恢復外交關係，作為解決中東問題的一項步驟。一九八六年初，以色列亦醞釀與蘇聯改善關係。由於以色列本土人口只有三百五十萬，面對著其所佔領的阿拉伯領土內，迅速增長的阿拉伯人口，實令以色列擔心有朝一日，其境內的阿拉伯人口會超過猶太人，而對國家產生不利之影響。故倘若蘇聯能與以色列復交，進而允許蘇聯猶太人移

註② Ibid., pp. 36-37.

民以色列，則不僅可以解決以色列的實際需要，而且可緩和蘇聯對阿拉伯國家的支持。一九八六年一月，以色列駐美大使羅森（Meir Rosene）與蘇聯駐美大使杜布萊寧，曾在華盛頓舉行秘密會談，羅氏即曾試圖說服杜氏允許更多的蘇聯猶太人移民以色列。②據以色列表示，目前住在蘇聯境內的猶太人約有二百五十萬人，其中有四十萬人想移民以色列。

一九八六年八月，蘇聯與以色列代表團在赫爾辛基舉行領事級談判會議，此乃廿年來，雙方正式公開的外交接觸。會中討論了雙方關係之重建與猶太人的移民問題，但無具體結果。據蘇聯外交部發言人卡拉西莫夫（Gennadi I. Gerasimov）於會後表示，該會會期原訂兩天，但因以色列提出「政治問題」，致使會議進行九十分鐘即告流產；卡氏宣稱以色列無權代表蘇聯猶太人發言，並指此乃干涉蘇聯內政之舉。③同年九月廿二日，蘇聯外長謝瓦納澤與以色列總理裴瑞斯在聯合國總部晤談，這也是卅五年來兩國最高階層的會談；其中討論了雙邊關係、中東和平問題與蘇聯猶太人問題，惟仍無具體結果。④然而，裴瑞斯聲稱此一會談為雙方對話的開始，有助兩國關係之恢復。

今（一九八七）年三月底，蘇境猶太人全國會議（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viet Jewry）主席艾拉（Morris B. Aram）與世界猶太會議（World Jewish Congress）主席布朗夫曼（Edgar Bronfman）聯袂訪問莫斯科，會晤了蘇聯官員。據渠等表示，蘇聯業已允許一萬一千名至一萬二千五百名猶太人，在今年內經由羅馬尼亞移民國外，並同意進口猶太宗教書籍與設立猶太教堂。⑤未幾，卡拉西莫夫隨即否認將允許特定數額的猶太人移民以色列之說。觀蘇聯之所以不願承認，可能是受到阿拉伯國家輿論的抨擊。阿拉伯聯盟秘書長喀利比（Chadi Khibi）指出，倘蘇聯同意猶太人移民，勢將成為中東和談的一項障礙；此外，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兩家報紙，亦猛烈譴責莫斯科試圖與以色列改善關係。⑥四月初，據以色列電臺報導，蘇聯可能於近期內派遣一支領事代表團訪問以色列，但在同月十九日，莫斯科方面宣布取消此行，理由是以色列正利用此一消息進行宣傳。由上述近兩年來蘇以之接觸看來，雖然未能達成具體結果，但顯然已較往昔更為熱絡。

展望未來蘇以關係正常化，在諸多因素之交互影響下，情況一時仍不易明朗化。首先，蘇聯仍然希望透過文化和貿易交流來擴展雙方關係，並作為恢復邦交的序曲。因為蘇聯堅持雙方建交的必要條件，在於以色列須先撤出一九六七年戰爭中所佔領的土地。就以以色列而言，現任外長裴瑞斯，曾一再表示歡迎蘇聯參與中東國際和會，惟條件是莫斯科須先承認以色列。不過，現任總

註② *Washington Post*, Jan. 31, 1986, p. 11

註③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ug. 20, 1986, p. 1.

註④ Bernard Reich, "Israel's Year of Transition", *Current History*, Feb. 1987, p. 88.

註⑤ *Arab News*, April 1, 1987, p. 4.

註⑥ *Arab News*, April 3, 1987, p. 1.

理夏米爾，則持異議。渠認為召開國際會議，唯有使問題更趨複雜，並可能使以色列退出佔領的土地，甚且導致巴勒斯坦人建國，而危及以色列的生存。然而，在兩國缺乏正式外交的情況下，蘇聯的損失實比以色列還要大。因為當前的情勢有利於美國將蘇聯排除在中東和談的程序之外，使蘇聯在該區域的影響力更形式微。儘管如此，蘇聯仍需堅持其對以色列的一貫立場，否則將會破壞蘇聯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形象。

最後，蘇聯亦懼怕以色列在莫斯科設大使館，此不僅會增加以色列與蘇聯猶太人的聯繫，而且也會出現大量申請移民的案件。以色列方面亦憂慮蘇聯外交官在特拉維夫的駐留，可能會從事間諜活動，並與以色列境內的阿拉伯人進行接觸。再者，以色列軍方亦不若學者那般地熱衷蘇聯參與以阿談判。渠等不相信莫斯科在未來談判中會扮演建設性的角色，也不認為其會改變偏袒阿拉伯國家的立場；反之，蘇聯之圖謀只是要在中東地區和美國競逐影響力。從上述分析可知，蘇聯與以色列基於各種因素的考慮，關係正常化在近期內仍不可能達成，除非以阿爭端先有某種程度的解決。於此情況下，蘇聯與以色列之間的默契外交，仍將繼續推動下去。

（本文作者現為本中心助理研究員）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

中共與宗教

本書由本中心中國大陸組召集人汪學文主編，本中心研究人員汪學文、朱文琳、邢國強、廖淑馨、江振昌、陳永生、葉禪英等合著；內容包括：共產主義者的宗教觀、中共的宗教政策、中共與天主教、中共與基督教、中共與佛教、中共與伊斯蘭教、中共與道教等。全書廿二萬字，計四〇〇頁。實售平裝新臺幣二〇〇元，精裝二四〇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六元）。

郵政劃撥帳號：〇〇〇三四三六一二號

戶名：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地址：臺北市木柵區萬壽路六四號

電話：九三九四九二一轉二二六